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05

# 从“两个结合”看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

王亚茹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史华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态度理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等特点,他不仅强调“学理化”,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学术化,而且强调“多元化”,通过运用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图绘出毛泽东“人物肖像”,还强调“人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又“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当然,史华慈基于特定的知识背景、学科意识、价值旨归,其研究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异域色彩”,其中不乏误读与理论局限性。因而,我们应该从“两个结合”视角出发理解和把握史华慈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本杰明·史华慈;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031-08

纵观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七十年的学术景观,毋庸置疑,史华慈<sup>①</sup>是非常耀眼的一颗明星。同为大学者的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曾说过,“史华慈教授是美国惟一的既研究中国政治、又研究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的学者”<sup>②</sup>。显然,毛泽东研究不是史华慈学术研究的全部,但他并没有因最初研究动机,即意识形态咨询功能的弱化而弃耕,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新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立足于政治史、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语境,将毛泽东放置于不同参照系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比较,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方法论资源。然而,国内外学者囿于各自的学科意识,习惯性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为依托,聚焦“毛主义”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或围绕国外毛泽东研究前两次论战细节展开讨论,却鲜少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史华慈的其他文本群,难以知晓史华慈走进毛泽东的路径规划及其思想效应。基于此,本

文力图在“两个结合”上,对史华慈眼中的毛泽东及其思想作出较为完整地勾勒,以期深化相关研究工作。

## 一 问题缘起: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认识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成就与实践创新等方面所彰显的重要特征,这一历史进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其中,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应“区域研究”(Area Study)与政府政策咨询的需求而开启。其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态势分析,以及如何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华

收稿日期:2022-10-26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0—),女,安徽铜陵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sup>①</sup>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是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专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家庭,并熟练掌握12种语言,在哈佛大学读书并留校任教。他从毛泽东与中共革命史研究入手,撰写出广为人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年)一书。之后,他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创作出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年)。在经过长期的学术沉淀和文化遨游的基础上,笔耕出耐人寻味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年)。

<sup>②</sup>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

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但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西方人为制造紧张氛围,指认中共和苏共是“整钢一块”,臆造“中国威胁论”“共产主义扩张论”。对此,费正清强调应客观、准确看待国际局势,认为美国政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因缺乏沟通致使误判,以及学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缺乏历史分析方法的支撑,故批驳“中国革命是一场莫斯科在远东的阴谋”等错误论调。当美国现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成果无法解释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之时,费正清秉持着社会责任感推进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建工作,打造梯队衔接、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人才体系。

在费正清的帮助与支持下,史华慈重返哈佛参与远东地区课题的研究<sup>①</sup>,在博士论文中所提出和使用的“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一术语,亦是延续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常”的理论传统。在1951年问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摒弃了机械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做法,而是采用“人的模式”<sup>②</sup>和“三角互动”<sup>③</sup>等方法,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之中综合透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从微观层面考证分析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由此引出两条线索:明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发和展开;暗线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逐渐呈现。在史华慈看来,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其历程是经由李大钊、陈独秀、霍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等革命精英,在面对错综复杂政治环境带来的

新矛盾和新挑战时,不断思考、琢磨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或未完成什么任务,从而一步步展开的<sup>④</sup>。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权力重心之所以转移到毛泽东手中,不是莫斯科任何决定的结果<sup>⑤</sup>,而是中国革命的处境与权力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sup>⑥</sup>。且逐步将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指明新方向谱写新篇章。总之,正是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张力关系中,“毛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战略形成和发展起来。

在史华慈的时政聚焦和学术视野中,“毛主义”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提出,表面上看是用词习惯或话语方式的求新立异,实际上是就西方政媒两界,以及主流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提出的不同见解,即强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本质上讲是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具体而言,其一,马克思主义无法穷尽真理,经典文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渐过程中不断分化,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不是丰富<sup>⑦</sup>。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式、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这是把握“毛主义”的理论前提。其二,“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必须将它视为独立的个体<sup>⑧</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

①朱政惠:《史华慈学谱(1916—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在史华慈看来,人性的吊诡就在于他具有自主性和可堕落性。同一个人是如何一方面被束缚在自己的时空、社会阶层、文化和心理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又可以相信自己观点和行为建立在事物的本然和应然之上,这是一种人性的奥秘。史华慈将探究错综复杂的人的意识世界、理解无法破解的终极人生奥秘作为终身志业。参见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4页。

③史华慈预设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任务是着重研究人的意识活动,并且他强调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尤其是精神状态(忧虑、喜悦、伤感等)。人的意识活动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在客观、现实、具体的环境中一步步展开的。例如,在分析中国政治人物为何制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既要考虑到政治人物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要考虑其内在因素(个人经历、性格、爱好)所产生的作用。由此,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是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本方法。参见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页。

④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⑤Benjamin Schwartz.“Marx and Lenin in China”,*Far Eastern Survey*, 1949,18(15):174-178.

⑥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⑦Benjamin Schwartz.“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Foreign Affairs*, 1955,34(1):67-76.

⑧Benjamin I.Schwartz.*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39-40.

的发展,史华慈笔下的“毛主义”<sup>①</sup>内涵不断丰富。“毛主义”在狭义上是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形成的“战略战术”。在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整风运动”“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发展阶段之后,“毛主义”在广义上是指毛泽东个人一生的思想与实践发展历程。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旨趣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史华慈认识到,毛泽东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实践化。中国革命取得奇迹般胜利这一结果的背后,不是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统观全局和精心策划,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但是史华慈却主观地认为,这些战略战术有的甚至违背了当时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莫斯科的正统教义<sup>②</sup>,并且,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地位,强调组织城市工人运动,与毛泽东重视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之间存在差异,是“毛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发展的贡献<sup>③</sup>,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而是为马克思主义走向分化过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

## 二 研究推进:史华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解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耦合

按理说在对中苏关系、中国党内政治关系、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等核心议题作出系统性求解之后,历史与逻辑地引出“毛主义”,史华慈的研究任务本该告一段落。但是,单向度的研究理路从不是史华慈的治学风格。在撰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的过程中,史华慈已经察觉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受到“五四”

时期激进的反传统思潮的影响,而他们只是20世纪以来求解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不能按迹循踪,对独特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思想溯源,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等人的思想世界的<sup>④</sup>。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史华慈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直面和探索毛泽东、严复等人思想背后的广阔而深邃的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与此同时,史华慈的研究还受到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的影响。他预设了人类社会存在共同智慧和经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思想文化体系往往围绕着地球村某些共同的关切或困境提出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中有些相去甚远,有些则相差无几。那么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史华慈自然是心怀深刻的问题意识对毛泽东时代的新局面作出理论分析。加之,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先后爆发过两次论战<sup>⑤</sup>。无论是对论战的反思,还是研究的推进,史华慈逐渐将探讨的重心转移到“毛主义”概念背后所涉及的更深层问题域,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由此衍生的关于毛泽东身份定位的二重辨析,即究竟是“地道的中国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而展开的双重审视,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孰轻孰重。

在史华慈看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与融通。毛泽东作为具有强烈民族自信心和历史文化认同感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处理两者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修养的中国人<sup>⑥</sup>。他出生于清朝末期湖南韶山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经历使得他日后难以

①史华慈等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毛主义”(Maoism)、毛泽东的思想(Thought of Mao Zedong)、毛主义愿景(Maoist vision)等词语。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作为国外学者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存在差异性。

②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③Benjamin Schwartz.“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Foreign Affairs*, 1955,34(1):67-76.

④Benjamin I. Schwartz.*China and Other Matt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

⑤裴宜理:《当代中国的毛主义辩论》——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萧延中译,《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2期。

⑥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认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农民视为消极愚昧者的观点<sup>①</sup>。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由辉煌经劫难而衰落。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他,强调读书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他不仅接触了民间的通俗文化,而且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sup>②</sup>。中国传统文化如同一座图书馆,从中可以汲取源源不断的知识和养分。毛泽东不仅强调以古为镜,而且善于引用或化用章句、典故、诗词,中国传统文化从表现形式到主要内容深刻地影响了他。比如,中国传统思想流派,特别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强调“为政以德”“民贵君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英雄小说之类的民间通俗文化中包含的“侠”的思想,皆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sup>③</sup>。不过,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式思想的冲击下渐渐式微,这一现状几乎伴随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毛泽东从接受传统教育的洗礼走向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他和大多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出生的人一样,受到中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和熏陶。那段时期涌现的相关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和透露出的政治主张,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知识面<sup>④</sup>,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心路历程和文化性格,为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奠定了基础<sup>⑤</sup>。显然,毛泽东没有固守“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的立场,而是将中西方文明差异以及“落后”和“先进”之分,有效转化为民族性差异和时代性差异问题。这为他走上历史舞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在史华慈看来,毛泽东是一位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在毛泽东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注重搜集和阅读了《共产党宣

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学懂弄通理论上下功夫,辩证把握国情、世情、党情,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就实践层面的结合而言,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本本”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解决“挨打”问题之后,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若干矛盾以及苏联模式弊端的日益暴露,毛泽东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此时的史华慈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去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道路的一体同构关系。他注意到,在1956年初,毛泽东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宣布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为生产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扫除障碍。他相信爱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在文化、科技、技术领域的任务<sup>⑥</sup>。但在1956年底,毛泽东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感到忧虑和不安。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逐步转向新的设想,他相信美好社会即将到来,美好生活不断变为现实,大跃进是超越苏联模式的一次胜利<sup>⑦</sup>。可是,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沮丧而谨慎地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缺少经验,经济强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中强调走好“自己的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主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次的试验,亦折射出“救赎”和“挫败”的复杂关系<sup>⑧</sup>。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是他留给世人坚实的遗产<sup>⑨</sup>。就理论层面的结合而言,毛泽东积极探索

① 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② 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③ 史华慈,中嶋岭雄:《美日学者对谈录——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载萧延中等编译:《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④ 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⑤ 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⑥ Benjamin Schwartz. "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 Som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 Goal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5, (21): 3-19.

⑦ Benjamin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3, 31(1): 17-26.

⑧ 史华慈:《毛泽东晚年思想:在整体救赎与全面挫折之间》,陈玮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⑨ 史华慈,中嶋岭雄:《美日学者对谈录——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载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面临着能否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能否达成文化认同和调适民族心理的问题。毛泽东认清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即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有契合之处,着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汲取养料,用民族形式解释和改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管弦乐协奏曲中有着儒家的“弦外之音”<sup>①</sup>。此外,史华慈更多地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看待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实践的深层意图。他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是一脉相通的,且卢梭的道德政治观与中国古代圣贤关于道德与政治的某些论点也是同声相应的<sup>②</sup>。毛泽东思想世界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座都极为复杂,是由他的人格特征和政治领导本领以及他置身的具体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但在理论底色上是用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具体情境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理论。

### 三 评价:关于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sup>③</sup>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内在机理,生动地揭示了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史华慈较早地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关系,其中既不乏真知灼见,也有偏颇之处。对此,我们可在“两个结合”中理解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反思和驳斥。

#### (一) 立场:以理性的学术姿态加以审视

史华慈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问题研究”的过渡性人物,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奠基性人物,是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专家,是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曾深情地指出:“有的人爱中国,有的人恨中国,我尊重中国。”<sup>④</sup>他积极引导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思想视野中进行,使其向广度、深度和精密度发展,且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sup>⑤</sup>。在毛泽东研究方面,与刻意“美化”和“丑化”毛泽东的国外学者不同的是,史华慈力求基于客观的、具体的、现实的立场开展研究。他强调“学理化”,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推动毛泽东研究向走向学术化。他没有拘泥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这一特殊性定位,而是逐步将毛泽东视为单纯学术对象加以客观研究。此外,他在改善中美关系、普及公众教育、收集文献资料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他强调“多元化”,通过运用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图绘出毛泽东“人物肖像”。这是由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多重身份和革命功绩形塑的其本身形象的立体性,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学者在解读和建构毛泽东形象时呈现的差异性所决定的。他强调“人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又“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普遍性”意义。

史华慈的判断与研究,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诞生于美国一个犹太家庭,在世界顶尖学府读书并留校任教且熟练掌握多种语言<sup>⑥</sup>。特别是在目睹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之后,他强

<sup>①</sup>路克利:《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1页。

<sup>②</sup>史华慈:《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载许纪霖等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0页。

<sup>③</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sup>④</sup>许纪霖,朱政惠:《史华慈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封底。

<sup>⑤</sup>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或参见:Thomas A. Metzger. “The Definition of the Self, the Cosmos and Knowledge in Chou Thought: Some Comments on Professor Schwartz’s Study”,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68 (2): 68-116.

<sup>⑥</sup>朱政惠:《史华慈学谱(1916-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调人既有主观能动性,又具有“可堕失性”,永远无法成为神明。他的内在信仰、道德戒律以及民族身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其思想缘起和方法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与同时代学者一样,史华慈思索着如何规避法西斯式极权主义,化解日益暴露的现代性危机,重塑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与同时代学者不同的是,史华慈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分析,从走近毛泽东,到走近严复,再到走近诸子百家,抑或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到思想史研究,再到比较思想史研究,皆是为了在他者文化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收获动态的历史经验。当然,毛泽东及其思想既是史华慈的研究对象,也构成了史华慈的知识背景和认识视角。史华慈在文本耕犁和方法更新这两方面推动毛泽东研究向纵深发展,但因意识形态差异、文献资料真实性存疑等原因,他无法彻底克服“客观公允立场”的困境,易陷入非科学性、非确定性的“碎片化”解读。

## (二) 观点:异域诠释者提出的歧义性主张

在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中,关于“毛主义”的论述始终构成其理论研究的支撑点,“毛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的思想内核成为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核心问题。他对此问题的解答很具有影响力,但明显存在偏见和误读。对史华慈核心观点的辨析可以为我们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从“第一个结合”看,“毛主义”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史华慈提出并使用“毛主义”概念,用以描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发展落后的中国,使得马克思主义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发展,将之定位为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独创性异端”。这种判断和概括,奠定了美国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影响了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格局的流变,以及日后国外学者对“毛主义”的漫画式勾勒,其内涵意蕴随着勾勒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歧义性,而这种歧义性在某种程度上恰巧构成了毛泽东研究景观的

丰富性与多样性。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史华慈使用的“毛主义”已超出基本框架的规定范畴,与中国官方和主流学界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特指毛泽东个人一生的思想历程。“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内理论工作者张如心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sup>①</sup>,1942年2月,他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1942年7月,邓拓也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样的提法。直到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sup>②</sup>。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sup>③</sup>。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更为重要的是,“毛主义”这一概念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期盼。1948年,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想把新校成立典礼的讲话稿中使用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当时他打电报向毛泽东请求指示,毛泽东回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sup>④</sup>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认可“毛主义”这一概念。

从“第二个结合”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不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什么“主义”。史华慈认识到,毛泽东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逻辑分析能力、实地调查的丰富实践来制定战略决策,推进了

①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

②逢先知:《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③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8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思想植根于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土壤之中,其背后蕴藏着宽广深邃的问题域,理应在马列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思潮多元互动张力关系中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变迁,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史华慈强调中国现实、历史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持续影响,拔高了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改造,进而夸大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和断裂性,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应运而生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对此,我们坚决批判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也是正确理解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典范。

毛泽东曾告诫我们全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无论藏书阁里有多少珍本宝卷,也无法完成“旧邦新命”的任务<sup>②</sup>。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阶级状况出发,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提醒全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当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给以总结<sup>③</sup>。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的人民的、实践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蕴含着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至善至美的道德情操,寓意深远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观点主张上有诸多契合之处。毛泽东深谙这一

点,他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出发,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并丰富发展。可见,史华慈所理解的“毛主义”在理论底色上是用中国实际(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传统历史文化等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有意忽视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没有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才能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而且也只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开出绚丽之花。

### (三)方法:自我革命与方法论的引进

史华慈并没有一套体系完备的“方法论”,他的研究方法是由“关切和预设”组成的<sup>④</sup>。即便是在“冷战”氛围的影响下,史华慈仍为开展毛泽东研究,较为认真地进行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从史华慈著作的引文可以看出,他不仅收集了中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还整理和参阅了毛泽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不同版本的毛泽东文章进行了初步甄别、考证和分辨。并且,他广泛利用了西方、日本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研究毛泽东及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其中许多著作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正式出版。

史华慈重视对毛泽东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即是说,他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华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之中加以研究,以及超越时间维度和历史维度,将毛泽东与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进行对比研究。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的指引下极大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理论空间。但需要指出的是,史华慈对毛泽东文本的解读是从“作者”出发,时常会将承载作者思想原意的文本群“神圣化”和“教条化”。比如,在他的文章中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在处理农民与工人阶级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信条,另一方面,他指认毛泽东的革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

命路线和策略是马列主义的一种“异端”。实际上,史华慈是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得以不断细化、实化和深化的学说。这种“形而上学”的沉思必然导致前后说法相悖、逻辑无法自洽。这种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比性研究,本质上从属于“直接阅读”或“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即满足于字面上的阅读和对照式研究,忽视了文本背后所蕴藏的“深层逻辑结构”<sup>①</sup>。

在对历史资料、文本资源深入挖掘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方法和视角并非易事。史华慈为深入了解毛泽东,在研究过程中以潜心钻研的精神,创造性运用了“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等研究

方法,将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同人格特征、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探讨毛泽东的思想中内嵌的正确与错误、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因素,还原真实的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史华慈在力求重现历史的过程中,仍出现串联历史细节和强制阐释的倾向,未能处理好“主观预设”和“历史生成”的关系问题。总的来说,史华慈不仅采用了调查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方法、精神分析法等普遍的研究方法,而且采用了“人的模式”“三角互动”模式、思想谱系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等全新的解读方式。借鉴史华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打破传统分析模式,实现从“方法”到“材料”的有机整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开展毛泽东研究。

## Schwartz's Researches on Mao Zedong from "Two Combinations"

WANG Ya'r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enjamin Schwartz's researches to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 is overall rational in attitude, rich in content, innovative in perspective, and diverse in approach. He not only emphasizes "theorization", pushing the researches on Mao Zedong toward academicization in the gap between politics and ideology. Moreover, he highlights "diversification" and draws the "portrait of Mao Zedong" by apply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He also underlines the "human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the common concerns of human society that "fails to be definitely resolved". Admittedly, Schwartz's studies presents a different "exotic color" from that in China based on his distinctive knowledge background,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purpos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misinterpretations and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understand and grasp Schwartz'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Key words:** Mao Zedong; Benjamin Schwartz;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校对 唐尧)

<sup>①</sup>尚庆飞,张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进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